

吾思鱼所思

人类学理解认知、记忆和识读的方式

[英] 莫里斯·E. F. 布洛克 著 周雷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类学经典

沟通心理学、哲学、人工智能、

语言学、人类学之跨学科思维之作

How We Think They Think: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Cognition, Memory and Literacy

How We Think They Think: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Cognition, Memory and Literacy

How We Think They Think: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Cognition, Memory and Literacy

吾思鱼所思

人类学理解认知、记忆和识读的方式

[英] 莫里斯·E. F. 布洛克 著 周雷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吾思鱼所思:人类学理解认知、记忆和识读的方式/
(英)布洛克(Block, M. E. F.)著;周雷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32-2204-5

I. ①吾… II. ①布… ②周… III. ①人类学-文集
IV. ①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4118 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美术编辑 路 静

吾思鱼所思

——人类学理解认知、记忆和识读的方式

[英]莫里斯·E. F. 布洛克 著

周雷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www.ewen.cc 格致出版社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148,000
版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204-5/B·18
定价 36.00 元

译者序

丢失的包裹和我损失的记忆 ——对布洛克和伦敦往事的“认知”想象

我在第一次临别伦敦的时候，留下一个包裹在一个同学处，里面有我积累的所有课程讲义、我的伦敦笔记本、一些画稿、一些随手涂画的记录，这些杂物的上面盖着我穿了一年的野外工作裤——曾经伴随我在西藏荒野里的田野装备。可惜的是，这个包裹不见了，同学中途搬了一次家，他把东西放在客厅，他一直以为东西放在原处未动，直到我第二次返回伦敦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包裹消失了，一定是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把这个包裹当做没用的垃圾收走了。

我感到惋惜，当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一位老师，他说这让他想起一位知名人类学家的故事：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在一次田野归来时，丢失了他的一个箱子，里面有他的所有田野笔记，他最后只能依靠记忆来书写一本民族志，也就是人们可以看到的有关缅甸政治制度的叙述。

我感到惋惜，主要是因为我在伦敦期间，一直在临摹一本汉隶书法，用在中国买的毛笔在中国买的宣纸上面，铺在伦敦地下室的桌子上书写，特别是在无眠的午夜。此外，我在所有的课程讲义上留下了我的评述和笔记，另一本笔记本上则画满了我在上课听讲期间的胡思乱想。我想恢复这些记忆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那些复印下来的

课程讲义。对于宗教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的笔记和复印资料,我本来有个想法是回国之后,补充中国的文献和田野案例,做一些认知人类学中国化的尝试。英国因为知识产权和版权问题,复印比较昂贵且局限很多,这些积累了一年的文献的丢失对我个人而言,实在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损失。

我记得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修了一门认知人类学的课,主讲人是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他是一名思想敏锐的智者,年事已高,但是说话非常清楚。有一次,我在下课的时候去他办公室,说想把他的 *How We Think They Think* 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他听到之后很高兴,说愿意帮助我解决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他告诉我,他曾经在中国台湾地区当过访问学者,如果自己的书能被译介到中国,是一件好事。于是,从第一个学期开始,我一直在边上课边翻译这本书。这本融合了心理学、人类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的书事实上是布洛克多篇论文的合集,有些时间已经久远,但是并没有磨去思想的锋芒。我试图读懂它,并尝试和最新的研究结合,反思自己在中国的田野经验,研究其他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的同类研究,这其中包括丹·斯珀伯(Dan Sperber)的哲学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的研究,丽塔·阿斯图蒂(Rita Astuti)的马达加斯加研究,查尔斯·斯塔福德(Charles Stafford,中文名石瑞)的中国研究(特别是针对中国分离观念的研究)。在布洛克的研究中,他多次从认知科学的新近研究来反思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以及人类学的许多基本理论预设存在的问题,这其中包括知识和文化的属性。人类学家进入田野是以客体身份进入的,他面对的是异文化和他者,他主要的工作方式是通过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来整理数据,形成一个文本意义上的反思性民族志,这是一种结合了历史科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神话、民族学、地理学、植物学等多种学科的混合文本。人类学家特别重视当地性(ver-nacular)知识,间接引语和本真性构成一些民族志写作的基础,许多

具有科学精神或情结的人类学家甚至写出了“植物学意味的法律文本”，穷尽各种可能将自己的书写以科学的方式呈现。布洛克认为，许多文化和知识是非语言和非句式的，也就是说，它时常以非语言的方式存在、沟通和呈现，如果人类学家过于依赖语言所表达的事实，容易形成一个自我编织的认知陷阱。他提到了参与观察正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识获取方式，因为它通过大量的非语言方式，使得作为一个客体的人类学家像本地人一样认知自己的环境，理解其文化的意义。这个过程与学徒学习的过程类似：在一个陶器作坊中，师傅往往通过非语言的方式将知识传递到学徒脑中，许多学徒的学习通过大量的观察得以领悟，获得一种现实的实际操作经验和能力。

我至今记忆深刻的是认知人类学中一篇有关飞行器的研究——认知人类学家进入机舱展开田野调查，他研究了飞行器中飞行员的认知行为，及他们如何发展自己的判断能力。我在课程结束时和一个美国同学开玩笑，时差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机舱设计解决，时差或许是一种能量剩余和认知紊乱(cognitive seizure)，或许可以通过设计和认知弥补来修正这些生理感觉，最终产生一种长时间飞行的新时差效果。在阅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又在图书馆里找到一本野外认知的人类学书籍，探讨的是航行中的认知能力，特别是野外环境中的一些基础性元认知。这些研究让我大开眼界，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类学的浓厚自然科学属性。我曾参加过伦敦经济学院心理学系组织的一次国际会议，我记得当时的一位英国学者在进行一个超大规模的宗教研究计划，他不仅涉及了多种宗教类型，而且通过不同宗教类型的社区专门民族志，来完成“描述宗教”这一庞大的任务。从认知的元概念、时间概念、空间概念、反直觉、宗教感知的来源、人类的数字能力、马达加斯加的社会认知，我从认知人类学的课堂中获得了许多研究灵感，这些灵感都写在课程讲义的空白页中。我现在隐约知

道那些研究细节和想法的轮廓,但是我一走近,它们就消失了。

在学习宗教人类学课程的时候,我对宗教现象和鬼神观念也有许多反省和描述,特别是中国的神鬼、灵魂、魂魄、精魄所勾勒出的丰富、复杂的精神内涵,以及其中蕴藏的中国人的宗教元认知因素。我一度设想,应该从音乐,从宗教音乐、死亡音乐、哀乐中找到一些中国人思维特质的非文字线索,比如中国现行的哀乐是如何从民谣和民乐演变而来的,原来的曲调如何出现了变形而演变成现有的音调。此外,从中国的进补观念、古医书记载的药方、方术、谶纬、巫术、鬼魂小说中寻找中国人对死亡、灵魂、人的自我分类等重要内容的理解,对我们思考是否应该将中国人和东方人与西方人区分开来,人类究竟有没有一种基于精神、身体、灵魂的统一性认知,是否有帮助?当我们思考中西文明的未来时,我们往往忘记了一种身体转向的可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欲望发生机制、身体生理机制和欲望解决机制都被西方观念所劫持了。观赏中国的传统山水画和春官图,很少能看到男子身体的肌肉线条和对孔武有力的赞赏,女性的身体也是绵软而精致。相比较现代的催情形象系统——《男人装》、《时尚》、韩式美容等代表的丰满、风骚、挑逗、肉体先行、力量主导和频次崇拜——东方的传统审美具有一种稳定的时间美感。我们思考中国现代化所产生的城市化、城市症候、群体症候、政治症候时,是否应该注意这些疾病肌理背后的深刻的生理基础和身体重置因素?我们连自己的欲望都被置换了,我们的身体成为西方观念和知识系统的容器,我们只能为西方视觉符号所催情和致幻。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这些丢失的包裹会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需要什么办法,才能重新找回我在伦敦一年学习的课程记忆,重走那些轻描淡写、仍待推敲的思维小径?

序 言

正如书名所示,这本书里的论文,因其和人类学相关,涉及认知、记忆、识读。但是,因为所有的讨论皆有一个总体的理论探讨贯穿其中,这三类划分隐藏着一种更根本的统一性。主旨约言之下,每章各从起类,彼此之间的关联既有显明而确实的,也就是人类学家可以较易理解的属于报告人的知识类型,也有隐晦而无意识的知识,此类知识更为深层和根本。

集合在“认知”这个门类下的章节延续了一个肇源更早的讨论(Bloch 1977, 1986)。这些文章主要检讨有关文化和认知是否可等量齐观的理论预设,有关这一点,我认为在大部分人类学讨论中约略都有某种暗示。然而,我认为当人类学家讨论自己所欲分析的某些特殊文化表征时,更多的是基于显明的文化事实,这或许是因为人类学家所获得的知识多半由报告人表述,或是通过实践的仪礼所推导出来的事实。这些材料不足以让我们理解这些人群所生存的世界。对文化和认知不加甄别,将导致疑窦丛生,因为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特殊类别的表征,俨然是涂尔干所讨论的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这其实是各种知识的本源性问题,即哲学家们数个世纪以来都关注的理解之门类区分问题。

这种混淆和错误也有另外的坏处。因为将文化理解为如此产制,更夸大了不同人群所依存的文化多变性(variability)的印象,如

果不谈文化相对性的话。这种错误的印象必然使人们认为那些原来被称之为“文化”的意义构建创制材料只不过是两种情形：第一，文化只不过是报告人的表述，听起来新异陌生，因而使得人类学家和读者们闻奇而录，与此同时，很多看起来很正常和熟悉的视像被忽略了，因为它们被认为庸常无意义；第二，文化不过是通过观察仪礼场景所推演出来的表征，正如第4章所说，当地人通过对照一个自在的正常世界，凭借自然的反常识否定，以新异为是，以寻常为非而呈现出来（Boyer 1994）。对于遍居全球的各类差异人群之文化，通过此类材料选择逻辑来构建文化叙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家都在关注差异和新异，误导和夸大了人类知识异国情调和新异的特质。

有些文章对这些分析进行了合理批判，由几位作者提出，之后我也有呼应（Bloch 1989），尽管这些作者指出了此说的夸大倾向，将文化呈现理解成为异常和奇怪的形态，视之以各类知识构筑的要素。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默认这类文化呈现为非典型的自然和存在，我之前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没有被理论化，也就是说：与此类新异理念呈现对应的是日常生活形态的知识。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本书有关认知的章节主要是对这种缺省或错误进行修正，也就是去研究为什么日常生活的知识，有时必须是非显在的。它如何混压进日常的行动层面？认知科学家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家的发现将对人类学家的研究有哪些帮助？这是第1章的目的。题名为“哪些是不言自明的”以及“认知和民族志”的两个章节主要是通过使用第1章所言的基础理论观点来分析具体的民族志分析场景，也就是马达加斯加的扎费曼尼瑞——我在此的田野工作超过20年。

第5章开启的是有关“记忆”的讨论，与前面的讨论略有不同，前面是讨论人类学家应该如何应用认知科学的成果，这里是反过来——心理学家们应该注意人类学家对人的综合研究，特别是对于亲属制度的专门研究。最后，基本的信息往往是一样的：社会科学和

心理学不能也不应该忽视对方已经研究出的成果。

剩余的章节有关记忆,这些论述多彼此关联,因为大部分依赖于我在扎费曼尼瑞的田野资料,尤其是一个小的森林部族对1947年可怕事件的回忆;在这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可怕战争中,马达加斯加有大约10万人死亡。这个村子在战争中被烧成废墟。大部分村民死了,少数人逃到森林里,度过了苦难岁月。直到最近,他们才愿意提及此事,并将这些故事告诉我。第1章讨论的是这一创伤记忆时期,第6章关注对这一岁月的描述,村民的故地回访,对未来的希冀和社会构建的达成。这些描述是通过一种排演良好(well-rehearsed)的叙事讲出来的,讲述了村里长者的切身经历。第7章也是有关战争的描述,但是同时也是用这本书中所引入的理论视角,对此前的论文进行批判。主要的意见是:对发生的事实的记忆永远不能与某种特殊的叙事描述等同。这种界限的划分相当于一个更具综合性的论点,那就是一般来说文化,特殊来讲就是历史知识,通常都是一种特殊现象,为语言所不逮,因此不能和显明的表述等同。第8章延续了第7章的讨论,研究了历史事件的记忆如何不凭借叙事媒介得以在代际传递。

第9章开始讨论识读问题。在本书的文章中,这个讨论时间更早些,但是也涉及一些关联性的问题,同样也是基于扎费曼尼瑞的田野工作。在这个章节中,我认为许多文化架构(schemes),例如书写的星象学文本——被人类学家视为马达加斯加文化的结构框架,其实并不为一般民众所知。事实上,这些架构即使被普通民众知道,也是被当作一种奇异物理解的,它能发挥威力也是基于此,而非民众的思维架构。换言之,在这个例子中,我认为识读的效果并没有对认知本身进行革命,尽管有些人认同这种革命观(Goody 1977),而只是阐释了某种知识形态,对他们理解世界有一定影响罢了。这个主题在余下的第10章和第11章一以贯之。在第10章中,我认为书写和语

言的关系,进而和思维的关系,在不同的场景下是不同的,也因书写本身的变化存在差异。例如,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因此,不能由此分析得出一个综合的有关书写的论断,用于分析不同的书写系统,例如日本和欧洲。第11章讨论的是当今扎费曼尼瑞识读应用的意义和无意义,在当地自20世纪40年代只有少数人能读写。它继续分析了这些讨论的意义,以及在此类场景中课堂教育的社会属性。在最后一章,一个有关马达加斯加农民法语应用的短篇,他们对这种语言的知识弃之不顾,只用它来使唤牲口。

参考文献

- Bloch, M. 1977.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he present. *Man* n. s. 13: 21-33.
- _____. 1986. From cognition to ideology. In *Knowledge and power: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ed.) R. Fardon. Edinburgh: Scottish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9. Foreword. *Ritual, history and power: selected papers in anthropology*, LSE Monograph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No. 58. London: Athlone Press.
- Boyer, P. 1994. *The naturalness of religious ide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ody, J. 1977.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i 序 言

第一编 认知

003 第 1 章 语言、人类学和认知科学

024 第 2 章 不言自明:扎费曼尼瑞社会的
概念构型过程

042 第 3 章 认知与民族志

060 第 4 章 领域特殊性、生物和象征
主义

第二编 记忆

075 第 5 章 内部记忆和外部记忆:历史
存在的不同方式

095 第 6 章 马达加斯加的扎费曼尼瑞
人:屋子的复活

110 第 7 章 时间、叙事以及对历史的多
重再现

125 第 8 章 自传式记忆和对更遥远过
往的历史记忆

第三编 书写

- 143 第 9 章 马达加斯加的占星术和
书写
- 166 第 10 章 识读和启蒙
- 186 第 11 章 扎费曼尼瑞村庄中教学和
识读的作用
- 209 第 12 章 为什么马达加斯加的牛说
法语

第一编

认 知

第 1 章 语言、人类学和认知科学

本章最初为纪念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的演讲,这里的讨论构成本书的基本章节,为后面的叙述打下了基础。本章有几则基本阐述:首先,本章讨论了认知科学对人类学的重要性;第二,本章提出人们所思所想的真实表意常为口语表达所不逮,形意时常不合;第三,本章认为实践中用到的知识应当有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使得迅速获取成为可能,因此,它从本质上来说是非线性的;第四,本章从人类学角度观照并揭示其意义;第五,本章从理论上探讨参与观察的重要性。本章在阐述上述观点时使用了联结主义理论(connectionist theory),但频繁提及这一理论并不意味着作者认为应过于倚重这一理论。

I

认知科学常被描述成沟通多学科壁垒的一种尝试:将心理学、哲学、神经生理学、人工智能、语言学和人类学知识整合起来用于理解认知。在这种联合中,人类学实际上只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伙伴。只有认知人类学的研究被认知科学家所重视,而且即便如此,后者重视的也只是前者

的一些深入的领域，跟许多人类学家，尤其是欧洲人类学家的工作毫不相关。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因为萌生于认知科学的许多理论对于人类学来说——无论是社会人类学还是文化人类学——都是重要的，而且足以引领人类学家重新审视其研究的基础假设。当然，认知科学家也应该学习人类学所关注的领域，特别是他们恐怕没有想到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参与观察。

文化人类学家研究文化。文化可以定义为，人们为了适应特殊生存环境^[1]而必须掌握的各种知识。社会人类学家传统的方法是通过理解人类之间如何彼此联系，研究社会组织的构成和行为。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都彼此清楚，他们研究的两种领域并非绝对区隔。文化人类学家知道他们无法直接理解文化，只能通过观察沟通行为、口头表述或是通过自然及人工设计的研究情境来理解。社会人类学家其实知道他们无法理解语言行为与非语言行为，除非他们能够构建或者想象所研究人群的文化图景，而后者是理解他者行为的惟一方式。（Winch 1958）

所以，一些有关文化的概念对于所有人类学家来说都至关重要。然而，人类学其实有一种进一步的假设——这种假设有时是默认的——那就是文化其实和语言不可分离，理由有二：（1）文化是通过语言作为一种文本来理解和传播的；（2）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语言式的”，由若干彼此联系的线性命题构成。对这里的两个假设，我想提出驳诘。

如果文化是人们为了适应特殊生存环境而必须掌握的所有或部分知识，根据这种逻辑阐述，人们一定已经获得了这种知识，这可以通过内在认知潜力的发展或通过外来资源来实现，有时是两者结合；第二，这种获得的知识被连续储存并可供必要时刻的随时获取^[2]。这些显而易见的推论又进一步意味着，人类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正是认知科学家的研究领域——不管人类学家是否喜欢，但是认知科学研究的就是学习、记忆和知识获取。因此，人类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使自己所构建的有关社会生活的理论与认知科学家研究学习和知识储存的某些发现对应起来。